

为了中华
——
为了世界
——
许嘉璐论文化
●中

许嘉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为了中华

为了世界

——许嘉璐论文化
中

许嘉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儒家思想与世界道德[※]

“新人文主义”是相对于传统的“人文主义”而提出的。从14世纪到16世纪，在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核心地带意大利的土壤里孕育着人性的呼唤、价值重建的胚胎。在这胚胎里隐藏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因。大约15—16世纪，西方一些学者开始知道了东方，知道了中国。于是，孔夫子的思想也加入到培育胚胎的营养液中。但是，当时的中国却对欧洲一无所知。

由于东西方的智慧相映相补，于是“人文主义”这株新的思想之树冒出地面，先后在德意志和法兰西成长起来。可惜的是，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不可能深入地把握孔夫子思想的精髓，亦即其深刻的哲学内涵。给他们带来局限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记录孔夫子思想言论的书籍，例如《论语》，是由粗通或不通汉语的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停留于表面；同时，他们是以基督教、天主教的观念来理解和翻译中国文献的，这必然影响并妨碍了欧洲思想家们对孔夫子的理解；二是中国当时是宋

※ 2012年4月16日在“巴黎尼山论坛”上的讲演。

代、明代理学盛行的时代，朝廷以宋代儒家大师朱熹编定并注释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科举的指定教科书，对儒家其他原典已经相当疏远，而对原典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教条化了。当时的学者没有关注中国境外之事，更不会关心孔夫子的书如何翻译和理解。这也必然影响了传教士对原典的认识，进而影响了西方思想家。

其实，孔夫子思想（我在这里宁肯用“思想”一词而不愿意用“学说”）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这体现为他主张施政者要让人民正常生活、繁衍，继而走向富足，进而实行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更体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他的“终极关怀”完全是儒家化的、伦理化的，即充分认识到人在道德领域的无限潜力。这种潜力在经过了教化的过程后，可以无止境地提高。他还明确地主张人的道德纯化过程是从幼小时开始的，是从对最亲近的父母敬重、热爱和顺从开始的；由对父母的爱，扩展到对兄弟的爱、对朋友的爱，再扩展到对天下所有人的爱。他在这方面的全部思想主张，概言之就是“仁”。为了规范并指导人们成为完整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具有仁爱之德的“人”，他力主恢复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周代的“礼”。他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实是寓“作”（创造）于“述”——即根据当下时代特色，凭借着他未来的睿智预测，而推行“礼”“乐”之教。过去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是：孔夫子所提倡和强调的“礼”是对个体自主性及其发展的束缚。但是如果深入地、多角度地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社会生活需要

一定的规范，“礼”作为这种规范的总称，不仅不会束缚个性，反而为个性的发展进行引导，创造适宜的环境和空间。这从《论语》中他和人们的对话，特别是和自己学生的问答与讨论中，就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总而言之，在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中的对物质的追求和对精神的追求二者之间，孔夫子首先选择了后者，即“人”在解决了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之后，就要着力于不断提升爱人之德——“仁”的水平。他认为只有这样对待社会上的种种关系，才有和谐、和平可言。可以说，他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大写的“人”进行的。

中国在近100多年来，由于接受了工业化文明的洗礼，原有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关于“仁”和“礼”的学说，彻底地被颠覆了，社会失去了道德准则。这是农耕文明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必然出现的现象，非人力所能左右。在这一民族文化的灾难中，许多急于为民族寻找出路的先行者，率先否定自己以孔夫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这不但加重了文化灾难，而且从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所继承的前此几百年的学者们对儒家原典、对潜在于“仁”“礼”等思想内部的普适性元素，的确缺乏更深入的开掘。这也是在强势文明猛然冲击下的必然现象：弱势文明来不及从容地、深入地在学习并吸收异质文化的同时进行宁静地反思、细致地分析、扎实地重建。

在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财富渐渐增加的同时，精神家园也在以同样的速度毁坏着，在原有已经破败不堪的基础上进一步毁坏着。人们也曾热衷于从来源于西方文化的

“人文主义”中汲取营养或依据。但是不久发现，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的理想，直至今天也没有实现，甚至和人们的企盼相反：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的现象似乎更为严重了，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有些自我标榜为最自由、最平等的国家，自己的麻烦更是层出不穷。于是，中国人又很合乎逻辑地开始普遍地反思自身的传统，寻觅民族应该具有的、也是适合未来的精神道路。但是人们——特别是中国的学术界——也认识到，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不可能按照古代的样子生活。而孔夫子及其历代传承者的言行都是由于他们所在的“当下”的刺激、为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危机而发、而为之；因而生活在今天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克隆”几千年前语境中“仁”“礼”等一系列伦理概念的全部内涵和外延，只能并必须在充分深入把握传统伦理的核心和精髓，做出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新的阐释和发挥，创新也就在其中了。换言之，充满人文精神的、以孔夫子为旗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在必须解决以下严峻课题：拂去千百年来蒙于其上的灰尘，尽量恢复其本来的光辉，在它的基础上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照亮已经在民族面前展开的精神道路。

文艺复兴时代所形成并得到广泛传播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对中世纪极端神权统治的反抗；我们姑且抛开这种人文思想自身所遇到的蜕变和扭曲问题，单是今天的世界情况也早已非昔日可比，也需要重新审视、阐释和发挥。我想，“新人文主义”命题的提出，就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原因。这样看来，无论是西方的“人文主义”，还是中国的“人文主义”，都是今天之所需。而二者之间在尊重“人”这一方面，有着

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二者的命运也很相近，都亟须突破历史的“声障”，重新走上珍惜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灵，把对于“他者”的爱，化为包容、尊重之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赋予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权利、义务的原本意义，构建起适合人类幸福、和平的生活与持续发展的新伦理。这就是我心中的、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新人文主义”，也可以说，这就是21世纪所形成的“世界道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西方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合，这不是偶然的——虽然历史事件常常是偶然的——而是时代使然。这也意味着，东西方文明正在一起勇敢地承担起思考、探究和引导人类未来的重任。我的结论是：人类——特别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智者——要珍惜过去，起于现在，为了未来！

探究“王道”原旨，关怀世界当下[※]

当今的世界，真是乱糟糟。冷战之后的种种战争和动乱，以及恐怖主义行径、人居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包括南北、行业、阶层间的差距）、各国社会动荡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至今还看不到结束之期的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北非中东的混乱局势、科特迪瓦的内战，也无不在影响着人类的正常发展。寻究起来，这些都与流行于全球的“霸道”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就连日本“3·11”的三灾并至，也不能说全是天灾，与“霸道”无关。

面对世界上种种威胁人类的事件和事故，各国的智者几十年来都在认真思考、分析，为时代把脉，为未来探寻出路。从斯宾格勒到汤恩比，从福柯到哈贝马斯，都曾经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指出了人类文化、思维和社会面临的危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他们的论证有许多和中华古老的文化有某种程度的暗合，无意间或有意地引导人们向东看，到中国的文化里觅寻智慧。

[※] 2011年4月22日在海峡两岸“弘扬中华文化，探讨‘王道’理念，构建和谐世界——‘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上的讲演。

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积累了成系统的、经历了五千年磨砺检验的、至今仍然沉淀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经验与理论。只不过近一百多年来，在有意强化的西方文化的聚光灯下，中国人质朴智慧的光芒显得暗淡了。在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中，“王道”思想就是一件值得世界各国参考的宝物。

众所周知，“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从殷纣王的囚室里刚刚被解放出来的箕子在回答周武王向他咨询循天理以治天下的道理时说的话，是他所理想的由一个君王统领众多诸侯国的原则和方针。可能这时王道两字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词语，所以汉唐经学家解之为“先王之道路”或“先王所立之道”（见郑玄注及孔颖达疏）。所谓“先王”一般是指夏、商、周。到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时，“王道”已经有了特定时代的特定内涵，即指往古王者以仁义统领诸国之道。三代是一统的，王是最高统帅。孟子的时代周王早已被边缘化，天下群雄并争，人民颠沛离散，饿殍塞路，孟子认为亟须一个能够“朝诸侯，有天下”的王者出现，以恢复三代一统而安定的局面。而达到“王”的途径，就是“王道”，也就是对内实行仁政，悦近而来远。通观他游说诸侯时所有宣传“王道”的论述，最为典型的是对齐宣王所说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无以，则王乎？”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均见于《孟子·梁惠王上》）这和他所说的“养生丧

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孟子那里，第一次把“王”和“霸”相对而提，例如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延至荀子，不但有“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荀子·王制》）、“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等关于“王者”之法的论述，而且其书有《王霸》一篇，专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道理，目的也是希望在诸侯中能够出现“一天下”的王者。

其实，孔子的仁政理想和伦理学说，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思想中，最终也是指向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鉴于“政由五伯（霸），诸侯恣行，淫侈不轨”，于是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迨及汉世，天下早已统一，“王道”所指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当汉元帝（时为太子）向其父亲宣帝提出应启用儒家时，得到的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斥责，甚至差点因此而丢掉继承皇位的资格（《汉书·元帝纪》）。不管是宣帝还是元帝，他们所说的霸、王之道，已经与战国时指国与国关系不同，纯然是指在一个大一统帝国内的施政问题了。借用“王道”概念以表达对朝廷施行仁政的期望，恐怕已经是当时的惯例。例如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或因天下动乱，或由国祚短暂，或以其时儒学不兴，关于王霸之说不彰。直到南宋朱熹与陈亮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持久（二人书信往还近十一年）而激烈的争论，王霸问题才尖

锐地提到士人面前。这就是陈亮所说的“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陈亮集》，《甲辰复朱元晦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大明”，应该是指经程、朱辨析，王霸与义利相对应的关系明确了。

陈亮门人芦侔的一段话似乎可以概括朱、陈之争的实质：“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亮）崛起其旁，独不以为然。且谓‘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案，指孔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案，指‘五行’和‘谷’）？《乾》无利，何以具四德（案，指元、亨、利、贞）？如之何其可废也。于是推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简大，坦然易行。”（《宋元学案·龙川学案》）

陈亮认为程门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已经不能使人心服；后之学者（实指朱熹）进而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他批评：“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另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甲辰复朱元晦书》）“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序》）朱熹则批评他

说：“同父（亮）在利欲胶漆盆中。”“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123）陈亮之所以据史实而言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是鉴于当时国力衰弱，北国南逼，认为空谈性理误国，应该提倡“以经制言事功”（黄宗羲语，见《龙川学案》序录）。因此其所言王霸是与义和利、理和欲、道和器，乃至内圣和外王相对应的概念；而其所谓“利”并非一己过分之利欲，而主要是指“无一念不在斯民”（《策·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之利，他的学说在程朱之学被视为正统之时，“遂为世所忌”（《龙川学案》黄百家按语），“无不大声排之”（全祖望《陈同甫论》，转引自《龙川学案》附录），但是对后世却影响至巨。不但在当时培养了一批重事功的学者，影响了浙东等地区的世风，即使明末清初“实学派”中执牛耳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其实也是远绍了龙川的精神和学说。如果我们把浙东一带现今民营企业格外发达的情况放到历史的背景中考察，恐怕也和永康、永嘉学说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朱、陈之所谓“王”与“霸”，实已离其原旨益远。而若“王”“霸”离开了孟荀原意，和义利、理欲以及道器结合起来，其实从来就不是截然二分互不关涉的。

粗略总括自战国至南宋关于王霸思想的运用和阐发，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四点，以供思考“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作为参考。

1. 孟子同孔子一样，树起传说中的“三代盛世”为标杆，以恢复天下一统为目的。所不同的是，孔子

希望诸侯施仁爱、崇礼乐、弃霸业、尊周室；孟子则面对几个争雄的超级大国，希望有一个诸侯国能够实行“王道”以统一天下。换言之，“王道”在孔孟那里是处理国与国关系、寻求一统的利器，“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他们的学说中已经成熟了。

2. 刘汉既已经过提倡黄老思想休养生息，又经文景之治以及武帝固边拓疆，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政权主要是处理内部问题，自然要“以霸王道杂之”，亦即恩威并用、儒法兼行。实则这时的“王”“霸”含义已经有别于孔、孟、荀，转指内政了。

3. 宋儒先是怨于五代时期道德沦丧，世风朽败，释氏流行，古学凋零，于是以道统自任，倡孔孟，探理、性，颂王道，正人心；继而陈亮一脉以国弱民贫、御侮无力为忧，故兴不弃利、欲、霸、器之说。其实两派不过各执一端，所以黄宗羲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但其实他是有些偏袒陈亮的，所以又说“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均见《龙川学案》按语）

4. 今之世界犹如中国战国时期之纷纷，与古不尽同者，霸权国家不仅凭借武力大倡“人权先于主权”“反恐无国界”以及“单边主义”，以强推自己的价值观为旗帜，任意征伐弱小，而且极力推销现代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工具理性，影响所及，促成了新兴国家在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侵蚀，加剧了文化断裂、社会撕裂、人心分裂。现在弘扬“王道”原旨，岂非恰逢其时！

其实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人们先后都有过体现“王道”思想的宣示。

例如，孙中山先生在90年前就说过：“中国人说，

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武力便是霸道”（《国父全集》第一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民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国父全集》第三册，第538—540页）“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个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这个民族才可以发达。”（《国父全集》第一册，第53页）他的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国父全集》第一册，第54页）

孙中山先生在这方面的种种论述都是本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思想。唯其如此，所以一脉相承至今。例如在孙中山先生身后约三十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也不会侵略别人，但是对人民反抗侵略的革命战争还是要支持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又过了二十几年，邓小平先生也说：“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因为三位伟人都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信心，所以能以中华民族的智慧，预见到中国一定会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走上富强之路。现在两岸一起来进一步探讨“王道”的内涵和当代意义，显然也是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继承、延伸和弘扬。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1924年讲上述那番话时，中

国正处于积贫积弱、努力挣脱帝国主义“次殖民”（孙中山语）统治的阶段，此时就说“济弱扶倾”以尽自己的天职，可能被讥为“言之无根”；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大陆正处经济困难时讲强大起来也不会侵略别人，也可被视为“浪漫”；邓小平先生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就说永远不称霸，或可被扭曲为“宣传姿态”；那么，在大陆靠 13 亿人民的努力开始强大、两岸关系由于彼此的善意而处于最好阶段、大陆几十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的实践已经让许多国家了解了中国人对待“天下”的态度的这个时期，我们再次以鲜明的语言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会和世界人民同舟共济的“王道”思想，肯定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王道”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投射到处理“天下”事务方面的结晶。三代时的“天下”，不过相当于现在的中原地区；汉代时的“天下”也没有超出现在中国的版图范围。在地球变成一个村庄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天下”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至宇宙。这就是说，随着天文地理等知识的不断拓展，“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爱胸怀也相应地不断扩大。爱屋及乌，由对各国人民的关切友好，自然更增强了对自然环境、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关怀。再者，孔孟提倡“王道”，最终是要一统天下，今天我们挖掘“王道”的丰富内涵，意在多元世界的和谐和平——今人早已超越了古之圣贤。王道思想包括了对人与人、人与天、身与心、现实与未来的深刻观察和思考，我们的探讨自然也必将涉及世界所需要的人文与物质危机的种种方面。我相信，我们的研讨会一定能够在很多议题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再谈“王道”思想与中国企业管理[※]

在明天的大会上，我将就“现代化”“全球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谈谈我的浅见，提出中国企业的管理如何与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的话题。现在，我就集中而简要地谈谈我对“王道”思想与企业管理的关系的看法，以向大家请教。因为我在施振荣先生办的“王道与企业管理研讨班”上海阶段讲过“王道”问题，所以今天是“再谈”，内容基本上和上次所讲不重复。

“王道”是传统文化中很耀眼的一个理念，是儒家提出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这样一个古老的思想能不能作为我们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的参考？用学术的话说就是，“王道”在今天，特别是作为中国企业管理的借鉴，有没有“合法性”？因此，我认为应该首先客观地评价中华传统文化，清除掉长期以来认为儒家“重义轻利”“保守”“反对新事物”“反对开放”，等等认识误区。

我们先来看事实。孔子一生履行着“有教无类”的教育民主原则。这在当时是极其进步的主张，是对

※ 2011年10月19日在“中国管理全球论坛静思会”上的演讲。

以往只有王室贵胄和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教育的颠覆。他亲自开办私学，让所有能够交上几根干肉（“束脩”）的人都能到他那里学习。有人为此而批评他没有举办免费教育，眼里只有有钱的人，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孔子办的是“成人教育”。从《史记·孔子世家》看，到他那里读书的，最小也要15岁以上。如果能够交出“束脩”，说明他生活基本上过得去，可以专心学习，“孺子”才“可教”。

在孔子的学生里有一位著名的大儒子贡，是位商人，经营有道，家累千金，孔子说他“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论语》里记录了他不少言谈，用孔子的思想衡量，他的确造诣很高；他先后当过鲁、卫的相，多次出使各国，受到诸侯们的尊重。孔子评论他是“瑚琏”之器，也就是宗庙里主要的祭祀之器，意思是治理国家的干才。据此，不能说孔子排斥经商，反而能说明他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比较原始的农耕社会，粮食等农作物是社会第一需求，当商业活动以及由商业带动起来的手工业威胁了农业生产时，统治者就要抑末（商）兴本（农），贬斥“淫巧”。在整个帝王时代，社会一直在平衡农—商—工三者的关系。后来这被认为是儒家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其实也是误会了。

儒家不但不守旧，相反，是讲究与时俱进的。儒家学说自身两千多年来的演变发展，对佛、道的包容并从中汲取营养，以致到宋代完成了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哲学最高峰。这条逐步改进发展的道路可以简约如下：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汉儒（马融、郑玄等）—唐儒（孔颖达、